

文心雕龍論叢

● 蔣祖怡 著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蒋祖怡 著

文心雕龙论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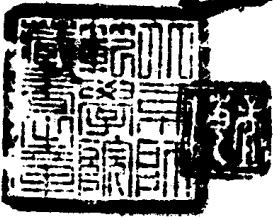
沙孟海题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32632

1032632



文心雕龙论丛

蒋祖怡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插页 2 印张 9.25 字数 199,000

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01—12,0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519 定价: 1.25 元

DC 64/17

目 录

《文心雕龙》内容述评·····	1
《文心雕龙》及其时代·····	10
论《文心雕龙》中的“神”、“理”、“术”·····	20
《文心雕龙》中的所谓“道”与“重文”思想·····	29
魏晋南北朝玄学与《文心雕龙》·····	44
《文心雕龙》文体论的特色及其局限·····	57
《文心雕龙》发微·····	68
从《辨骚篇》看《文心雕龙》的“通变之术”·····	84
《神思篇》中的四个重要问题·····	103
“才性”与“体性”——读《体性篇》·····	116
风清骨峻——读《风骨篇》·····	124
从“言志”到“缘情”——读《情采篇》·····	142
声得盐梅——读《声律篇》·····	158
多欲练辞，莫肯研术——读《总术篇》·····	173
《物色篇》试释——当时“山水文学”写作经验的总结·····	187
文情可鉴而又难鉴——读《知音篇》·····	202
《序志篇》疏证·····	213
刘勰《文心》与曹氏文论·····	235

刘勰《文心》与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	243
刘勰《文心》与陆机《文赋》	253
刘知幾《史通》与刘勰《文心雕龙》	266
鲁迅与《文心雕龙》	280
后记	294

《文心雕龙》内容述评

—

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最全面、最有系统性的理论巨著。清代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诗话篇》中说它“体大而虑周”，指的就是《文心》的这个特色。唐代刘知幾在他的《史通·自叙篇》中说：“词人属文，其体非一；譬若甘辛殊味，丹素异采，后来祖述，识味圆通，家有诋诃，人相掎摭，故刘勰《文心》生焉。”这就指出，刘氏《文心》的产生，是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。鲁迅在《论诗题记》中称赞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把它比作西方亚里斯多德的《诗学》。他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里也引述了《原道篇》和《辨骚篇》中的话，足见鲁迅对《文心》一书的重视。

《文心雕龙》一书中杰出的文艺思想，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对文学发展的卓越观点。刘勰认为一代文学的变化，既受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，同时，也有文学传统的继承关系。他从文学的历史发展中，总结出一条根本的规律：

故知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；原始以要终，虽百世可知也。（《时序篇》）

并用这个观点来解释“建安文学”产生的原因：

观其时文，雅好慷慨。良由世积乱离，风表俗怨，并志深而笔长，故梗概而多气也。

除了上述原因之外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文学传统的继承关系。《时序篇》讲到楚辞的产生道：

故知炜焯之奇意，出乎纵横之诡俗也。

在《辨骚篇》中又指出它对后代文学的影响：

故其叙情怨，则郁伊而易感；述离居，则怆怏而难怀；论山水，则循声而得貌；言节候，则披文而见时。是以枚、贾追风以入丽，马、扬沿波而得奇。其衣被词人，非一代也。故才高者苑其鸿裁；中巧者猎其艳辞；吟讽者衔其山川；童蒙者拾其香草。

《时序篇》又云：

爰自汉室，迄至成、哀，虽世渐百龄，辞人九变，而大抵所归，祖述楚辞，灵均余影，于是乎在。

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，和今天我们的看法也比较接近。

第二，对艺术构思和创造的看法。刘勰用《神思》一篇专门研究它，并且大大地发展了陆机在《文赋》中的观点。他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构思到表现的过程。还写出了创作的甘苦：

方其搦翰，气倍辞前；暨乎篇成，半折心始。何则？意翻空而易奇，言征实而难巧也。

这就是陆赋中所谓“恒患意不称物，言不逮意”的意思。

《神思篇》还企图回答陆赋中“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”的问题，认为这是由于“人之禀才，迟速异分；文之制体，大小殊功”主、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，并提出后天的“博见”和“贯一”，作为解决这问题的方法。虽然他的所谓“博见”和“贯一”，和今天我们强调认识生活和不断实践，还有较大的距

离,但是他强调后天的学习和锻炼,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第三,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,提出较正确的看法,并对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的写作倾向,进行批评。这种观点贯彻全书,在前半部文体论中评论具体作品时,也具体运用了这个原则。例如《章表篇》:“孔明之辞后主,志尽文畅”,又如《奏启篇》:“若夫贾谊之务农,晁错之兵事,匡衡之定郊,王吉之劝礼,温舒之缓狱,谷永之谏仙,理既切至,辞亦通畅”,都是以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并举的。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《情采篇》是从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专篇,首先讲了“文”与“质”两者的密切关系:“文附质”、“质待文”,说明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、相互影响的。而两者之中起决定作用的又是作品的内容。它说:

夫铅黛所以饰容,而盼情生于淑姿;文采所以饰言,而辩丽本于情性。

同时篇中还深刻地指出两种不同的创作道路:一是“为情而造文”;一是“为文而造情”。作者肯定了前者,否定了后者,并指出这是造成当时错误文风——形式主义的根源。

第四,对文学的继承革新,提出了卓越的见解。《邈变篇》说:

望今制奇,参古定法。

凭情以会通,负气以适变。

是“古”、“今”并重的。《序志篇》也说,“及其品列成文,有同乎旧谈者,非雷同也;势自不可异也;有异乎前论者,非苟异

也，理自不可同也。同之与异，不屑古今。”刘氏对“古”、“今”的态度，和东汉王充的观点很相近。《论衡·谢短篇》：“知古而不知今，谓之陆沈；知今而不知古，谓之盲瞽。”在王充的时代里，经学上主要的错误倾向是章句之儒的“崇古”与“泥古”，所以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“汉高于周”的观点。而在刘勰的时代里，主要错误是借“崇今”之名，来提倡绮靡的文风。所以《文心》里常常强调“雅正”，反对“爱奇”，并把“逐奇失正”的过分雕饰叫做“讹滥”。

第五，《文心》很重视民间文学。如以谣谚为五言诗的起源。“《召南·行露》，始肇半章，孺子、《沧浪》，亦有全曲；暇豫优歌，远见春秋，邪径童谣，近在成世；阅时取证，则五言久矣。”（《明诗篇》）“匹夫庶妇，讴吟土风”。（《乐府篇》）“夫观古之为隐，理周要务，岂为童稚之戏谑，搏髀而怵策哉！”“迷也者，回互其辞，使昏迷也。或体目文字，或图象品物，纤巧以弄思，浅察以衡辞，义欲婉而正，辞欲隐而显。”（《谐隐篇》）童谣和谜语都是民间文学，在封建社会里，是一般的士大夫文人所不齿的，而彦和在《文心》中一再提到，还专门把它列入《谐隐篇》。

第六，《明诗篇》叙述“玄言文学”之后，说到当时新出现的“山水文学”。《文心》特辟《物色》一篇，来总结“山水文学”的写作经验，并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种新品种在写作上的主要特点：“写气图貌”（即“情景交融”的问题）。《明诗篇》云：

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，偏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，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

所竟也。

《物色篇》云：

是以诗人感物，联类不穷。流连万象之际，沈吟视听之区；写气图貌，既随物以宛转；属采附声，亦与心而徘徊。

这充分表明，刘彦和重视文学上的新事物；同时，总结“山水文学”的写作经验，也意味着对“玄言文学”的否定。

第七，刘氏极重视批评与欣赏。《文心》中有《知音》、《指瑕》两篇，专门讨论这个问题，其中有不少很精辟的看法。如认为“文情（作品内容、作者的思想感情）可鉴而又难鉴”，一方面反对文学上的不可知论，另一方面又提倡对文学作品要反复钻研，反复吟味。又如反对批评、欣赏者只凭自己主观好恶来论文：“会己则嗟讽，异我则沮弃，各执一隅之解，欲拟万端之变，所谓东向而望，不见西墙也”。（《知音》）所以他提出建立一个“六观”的客观标准。这是由于“披文以入情”的批评、欣赏的过程的特点而规定的。篇中还强调批评、欣赏的能力，来自不断的批评、欣赏的实践：“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”。这些都是很可贵的。

第八，刘勰为了建设文学批评理论的需要，常常把一些有关术语，移植到文论中来：例如魏晋之间评论人物用的“才性”、“风骨”和玄学中的“虚静”等，都被移入《体性》、《风骨》诸篇，略加改造，成了文论中的专用语。这些词与原来的意义有些关系，但经过移植，已完全改变了它们的原义。例如“才性”，本来是魏晋时争论人的“才能”和“品德”之间有没有关系的，经刘勰移植到文论领域以后，变成品评作者的“才能”（写作才能）和作者的“品德”关系的用语。在《文

心》中又有两篇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。一是《才略篇》，专论作者写作的才能；一是《程器篇》，专论作者的德操品行。所以，刘氏所移植的“才性”问题，不单是《体性篇》中有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则是贯穿于《文心》全书的。

《文心雕龙》一书，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广。例如，《文心》论文体，骈散兼宗，此后，我国论文体即分为两大派：从《昭明文选》到近代孙德谦的《六朝丽指》是“主骈”的一派，从唐姚铉的《唐文粹》到清代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是“主散”的一派。又如《文心·神思篇》、《物色篇》和宋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所引《隐秀篇》佚文所提倡的“含蓄”，对后代诗文影响很大。唐代刘知幾《史通》一书中的所谓“用晦”（即“意在言外”），从唐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一直到清代王渔洋所倡“神韵说”主张诗要“含蓄”，都是受了它的影响的。

唐宋两代是散文复古的时代，对于这部用骈文写作的《文心雕龙》，自然不会提及。然而，在唐代，除现存唐人书写的《文心雕龙》（其残本藏敦煌莫高窟，现藏英国博物馆）外，徵引此书者甚多，其著者有刘知幾《史通·杂说下篇》、日本空海《文镜秘府论》、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、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与《毛诗正义》等。在宋代，有洪迈《容斋随笔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、王应麟《玉海》及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等。根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宋代有辛处信的《文心雕龙注》十卷。可见在盛行古文的唐宋时代，《文心》一书，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流传和重视。元代以后，特别是明清两代，注释和校勘、刻印《文心》的就更多了。离开我们将近一千五百年的齐、梁时代，刘勰这位卓越的文学理论

家，留给我们这样一部优秀的文学批评理论著作，确是值得我们自豪的。

二

但是，刘勰毕竟是一位将近一千五百年以前的人，他作于齐之末世（根据刘毓松的考证）的《文心雕龙》，也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一些局限。这主要表现在：

第一，刘勰在“大畅玄风”（《世说新语·文学篇》）、“摈落六艺”（裴子野《雕虫论》）、“视儒学为拘迂，不周世用”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杜恕传》）的时代里，继承荀子、扬雄“道”、“圣”、“经”的儒家传统，并以此作为针砭当时文弊的理论根据，原是无可厚非的。他的“宗经”，不但说各种文体，都源出于五经，而且要各种文章都以经典为楷模。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对待具体作品，如潘勗的《锡魏王九锡文》，刘勰认为它是“镕式经典，方规儒门”的典范作品，这分明是错误的。同样，他因为《诗经》多数是四言，所以认为“四言正体，以雅润为本；五言流调，则清丽居宗”（《明诗》）。以“四言”为“正体”，五言为“流调”，也是“宗经”思想在作怪，这也是错误的。我们认为诗从四言到五言，这是进步现象，但按刘勰的观点，则是提倡倒退。又如《辨骚篇》中记述了王逸和班固对《离骚》不同评价：班固对《骚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全部否定；而王逸则作了高度的肯定。但他们两人都是从“依经立议”的立场出发的。刘勰在这篇里，也参加了这场论争。他虽然站在王逸一边，但他也是从“依经立议”出发的。他用《诗经》作为标准，来评价《离骚》，认为《骚》有

四事，“同于风雅者也”；又有四事，“异乎经典者也”。刘氏所指“异乎经典”的“四个方面”，从今天看来，又恰恰是《离骚》中闪光的浪漫主义的因素。

第二，《梁书》本传称：“懿早孤，笃志好学，家贫不婚娶，依沙门僧祐，与之居处积十余年，遂博通经论”，“为文长于佛理”，又记载他曾整理定林寺的藏经。这虽然给他的著作带来了“体大而虑周”、注意对立面互相转化及引佛语入文论，丰富文论词汇的优点，但是，也造成有些地方硬搬佛理来解释古书、古事，显得有些勉强，甚至错误的现象。例如《论说篇》：“圣者彝训曰经，述经叙理曰论。论者，伦也。伦理不爽，则圣意不坠”和“昔仲尼微言，门人追记，故仰其经目，称为《论语》。盖群论立名，始于兹矣”这两个论点：一、《论语》之“论”，系议论之“论”；二、圣人之言为“经”，释“经”之作为“论”，都是错误的。试读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论语》者，孔子答弟子、时人及门人相与言而接闻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可见《论语》之“论”是“论纂”之“论”，不是“议论”之“论”，或“辩论”之“论”。其实，论说之体，并不始于《论语》，而且《论语》中大半是载言记事的，不纯粹是议论。刘氏因为“尊圣宗经”，把《论语》作为论说体的始祖，这种说法显然是很勉强的。第二点也不符合我国古代所谓的通例，完全是把佛典中“佛言为经，菩萨解经之言为论”的说法硬搬过来的。按照我国古代的通例，解“经”之言，称“注”、“疏”或“传”，而没有叫“论”的。

第三，刘懿思想观点上的局限性，也有不少是由他对具

体作品和人物的评价反映出来的。例如《史传篇》中批评班固的《汉书》为吕雉立纪，不是从吕氏荒淫残暴出发，而是这样说的：“吕后摄政，班史立纪，违经失实。何则？庖牺以来，未闻女帝者也。汉运所值，难为后法。牝鸡无晨，武王首誓；妇无与国，齐桓著盟。”这完全是封建的正统观点。又如《文心》的创作批评论多本于《文赋》，文体论则多本于挚虞的《文章流别论》，这是历来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。刘氏对后者评价还比较恰如其分，而对陆赋的评价则处处苛求。特别是在《序志篇》中把过去的文论作品，包括主张“漱六艺之芳润”的《文赋》在内，一概说成是“各照隙隅，鲜观衢路”，“并未振叶以寻根，观澜而索源，不述先哲之诰，无益后生之虑”等等，这未免有失公允。

以上是《文心》一书中反映出来的刘勰文艺思想、观点上的局限性。总的说来，《文心》一书，是瑕不掩瑜的。特别是总结文章的写作经验和针砭当时的文弊等方面，对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是有推进作用的。

《文心雕龙》及其时代

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，字彦和，生于刘宋，长于南齐，仕于萧梁，卒于萧梁。晚年出家，改名“慧地”。《序志篇》中说：“齿在逾立”，“乃始论文”。他撰述《文心》，是在他三十多岁未仕的时候（刘毓崧《文心雕龙书后》考证，正在齐之末世）。

刘师培在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里说：

中国文学，至两汉魏晋而大盛。然斯时文学，未尝别为一科。……真以“文学”特立一科者，自刘宋始。

按《南史·宋文帝本纪》云：

元嘉十五年，……立儒学馆于北郊，命雷次宗居之。十六年，上好儒雅，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素学，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，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，各聚门徒，多就业者，江左风俗，于斯为美，后言政化，称元嘉焉。

这是官府特立“文学”为一科之始。晋代荀勖创“四部”分类，其“丁部”为“集部”，中有诗赋，也有《汲冢书》，可见还比较庞杂。至齐王俭的《七志》，独立“文翰”一类。到梁代阮孝绪的《七录》，改“文翰”为“文集”。这是私人目录著述中反映出来的“文学”特立一科的过程。到了梁代，“文学”已完全成为独立的一种学科了。

为什么到刘宋时代，“文学”会成为独立的部门呢？那是由于文学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。这些变化是：

一、作家之多与作品之盛

史家称这个时代为“六代豪华”、“江左风流”。刘师培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载刘宋时代文学之士的姓名甚详。其诗文为当时所重者，则有谢灵运与颜延之。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云：

文章之美，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。纵横俊发，过于延之；深密则不如也。所著文章传于世。

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称：

字延年，……文章冠绝当时。……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，而迟速悬绝。……延之尝问鲍照已与灵运优劣。照曰：“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；君诗若铺锦列绣，亦雕缛满眼。”……是时议者以延之之灵慧，自潘岳、陆机之后，文士莫及，江右称潘、陆；江左称颜、谢焉。

由于当时以“九品论人”，出现了《人物志》一类作品。刘劭的《人物志》虽不限于文人，但其书在刘宋时颇为流行。同时，也出现了更多的《文章志》一类的作品，其著有：宋明帝《江左以来文章志》、傅亮《续文章志》、邱渊之《别集录》（又名《新集录》）、邱灵鞠《江左文章录》、沈约《宋世文章志》、任昉《文章始》（又名《文章缘起》）和姚察《续文章志》等等。

二、文章体裁的繁衍

鲁迅在他的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一文中，说魏晋人有好服药、饮酒、佯狂等“通脱”的风气。到了刘宋时代，这种风气有所变化。《宋书·吴勰传》载宋明帝下

诏禁止服药。所以，当时也有穿宽大的衣服，如《宋书·周朗传》载：“一袖之大，足断为两；一裙之长，可分为二。”但穿这样大的衣服，并不是因为吃药的缘故，而是佯狂。当时喝酒之风仍盛，但也不是为了吃药散发，而是为了要装名士。刘宋时代的风气，主要是“繁文缛节”。这对活人来说，是流行“笺”、“启”；对死人来说，是通行“碑”、“志”；加之佛教流行，出现“塔志”、“墓铭”等文体。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说“墓志”始于宋。又和当时笔记小说发生有关，产生一种“谐隐之文”，如齐卞彬有《蚤赋》、《虱赋》等作。由于文体繁衍，原来论文体的书，已不能完全包括，魏文《典论》附带谈到的八种文体，陆机《文赋》广为十体。晋挚虞、李充各有论文体的专书，但已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，所以详论文体很有必要。

三、声律说的日趋周密

刘勰的时代正是声律说日渐周密的时候。自范晔、谢庄在刘宋时论述声律以后，至沈约、谢朓，而声律之说到达成熟。日本空海（相当于我国的唐代时人）的《文镜秘府论》说：“宋末以来，始有‘四声’之目。”范晔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说：“性别宫商，识清浊，斯自然也。观古今文人，多不全了此处；纵有会此者，不必从根本中来。”又说：“手笔差易，文不拘韵故也。”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云：“音韵之学，自沈约为四声，及天竺梵学入中国，其术始密。”顾炎武《音论》也指出：“江左之文，自梁天监以前，多以‘去’、‘入’声同用，以后则绝不相通。是知‘四声’之论，起于永明，而定于齐、梁之间也。”对于写文章而用音律，锺嵘《诗品序》说：